

# 抗戰時期浙西多方作戰之回顧

鄭邦琨

## 一、前 言

去年十二月二日，筆者往賀阮毅成先生七十華誕，遇抗戰初期，即於浙西天目山區會同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佈置游擊種子，當時任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的羅霞天先生，及其他戰時伙伴多人。追談往事，殊多感念。以戰時浙西，地處衝要，平原地區，全部淪陷。而在漫長歲月、多方戰鬥中，能維持政權，直至勝利接收，實非常理所能預測。

回溯八年時間，在驚濤駭浪中，不僅政權始終維持，且有「前方政治看浙西，後方政治看贛南」之譽。所以如此，實歸功於民衆的愛國熱忱，暨負行政重任之浙西行署賀揚靈主任的主持得宜，擔當黨務、軍事責任者的互諒互助；工作同人以投身抗敵聖戰為天職，上下均以爭取勝利為唯一目標——生死榮辱，咸置度外，乃能履險如夷，獲得最後勝利，惟前方作戰之土氣，與民氣的發揚，有賴於後方的支援。當時浙西雖以天目山為對敵作戰的司令台，而省黨政機構則初在金（華）屬的方岩，繼遷處（州）屬的雲和，凡因地制宜之授權，與全國性政策的推進，端賴省級的決定與指導。時阮先生在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基於勝利第一之義，曾處處關顧前方。而為鞏固地方基

層，推行新縣制，更於二十九年四月，親蒞浙西前線，督導實務，並解決各項有關問題。是以筆者於祝壽歸來不久，浙西抗戰時期工作同仁羅賢晉、陳禮、周德培諸兄先後來談，咸以抗戰時期的浙西之對敵、對僞、對共各方面作戰，應予追記，藉為歷史寫下正確的記事，為流血流汗乃至犧牲生命的同仁留紀念，並亦為當時協助浙西抗戰之阮先生表祝嘏之忱。因各提簡要事實，由筆者主稿，臚列於後。

## 二、浙西抗戰時期的對敵作戰

自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中日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浙西在國防的地位，頓形重要。因上海為日寇事實的根據地，如戰事發生，敵人從上海登陸，分向京滬、滬杭兩鐵路，沿線前進，首都即受到威脅。是以中央分別與江（蘇）浙（江）兩省當局，計劃建築淞滬外圍的永久國防工程，除蘇境建錫澄國防線外，同時浙西亦築乍平嘉線——由浙西的乍浦鎮起，經平湖、嘉興、嘉善、而至蘇浙交界的王江涇鎮，全長八十餘公里。歷時三載，至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前夕，此項工程均已完成。同時因停戰協定限制我淞滬地區運兵的權利，二十五年，又於蘇州嘉興間，建築了蘇嘉鐵路，備增強首都外圍的軍事運輸。

於此，亦正見浙西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不過，抗戰爆發後，淞滬戰場因敵人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金山衛、全公亭登陸得逞，切斷滬杭鐵路，直向北侵。蘇嘉鐵路雖稍盡了軍事運輸的貢獻，而這歷時三載，中央與省合力建成護衛首都的國防工事，卻並未能加以利用。

二十六年冬，淞滬戰事告一段落，繼之首都淪陷，敵軍回師攻杭，自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十集團軍劉建緒總司令，由杭州撤向錢江南岸，並於深夜炸斷錢江大橋；駐天目山的一七六師區壽年部，亦於同日奉命撤守皖南，浙江二時竟無國軍駐防。惟當時原來的地方負責人士，暨富有血性的青年，乃至如長興地區河南籍客民，亦仿其故鄉的紅槍會組織，在敵前敵後，紛組游擊隊。據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東南日報載遠東社所發「浙西游擊隊——它的生長及其發展」一文中，追記純粹在浙西發動起來的游擊隊，除敵人首先侵入的平湖沿海，有陳新民及其所屬的孫祥珍、方振民、沈俊生的部隊外（尚漏列黃百器——雙鎗王八妹部隊——筆者附註），計滬杭鐵路附近，有嘉善的陳祖蔭和嘉興的姜維賢所部；在蘇嘉路附近，有范春生、王玉麟、劉琨所部；在嘉湖路以北，有溫延齡、王右人所部；在嘉湖路以南滬杭鐵路以西，有張玉如、吳辭炎、周明三所部（尚漏列

受行署特務營改編現在南港台北縣救濟院養老的吳良玉所屬的部隊——筆者附註）；在太湖至苕溪附近有李泉生、李正鴻、施公安、姚維德所部；在京杭國道以西，有郎玉麟、尚傑民、趙安民、雷少奎所部；在長興一帶，有謝正標、臧鳴皋所部；在餘杭、臨安、安吉、孝豐山嶽地帶有郭竟志、楊樹先、楊哲夫、沈子球所部。遠東社所發稿，以游擊區交通的不便，調查不易，故尚有未盡及稍有出入之處，惟亦可見當時民間游擊隊興起的蓬勃。

二十七年春回大地時，最高統帥指示第三戰區：「宜集我精銳，擊敵小部，一以阻敵轉動，一以振我士氣。戰而利，則益策進取。」於是七十九師，由富春江出動，分向杭州外圍留下、轉塘、凌家橋一帶進攻；並數度圍攻餘杭。六十三師渡錢江，在杭州附近，至長安、海寧、喬司游擊。及至三月，敵增兵淮南，再圖攻勢，為策應第五戰區，於是第六十二師、六十三師，奉命選編精壯，由餘姚、蕭山間潛渡錢江，深入敵後。六十二師師長陶柳，並進駐海鹽縣境，指揮戰鬥。敵人動脈的滬杭鐵路，曾一度切斷。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軍軍長陶廣，亦穿過敵人封鎖的京杭國道，深入吳（興）崇（德）桐（鄉）區，指揮六十二師，切實控制運河交通，一度攻克桐鄉、崇德兩縣城。同時，在該游擊區內，舉行黨政軍聯席會議，使敵人一時龜縮，不得不調空軍，沿運河塘及杭善公路轟炸掃射。而我民心士氣，在此時期，亦高昂至於沸騰。

國軍的挺進，政權的重建，軍政民衆的打成

一片，使敵人企圖在富庶的江南地區，實施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成為泡影。而須在杭、嘉、湖重要據點，經常費一師團以上的兵力，以保京、滬、杭交通。抗戰八年，浙西二十一縣市中，除新登、臨安、於潛、昌化、分水、安吉、孝豐等七縣境內，遇有敵軍流竄時，到有敵踪外；其餘十五縣市均在其戰略所繫的交通線內；而此十五縣市，曾為我軍克復或一度克復的有：餘杭——二十七年二月一度克復；富陽——二十八年三月一度克復；海甯——二十七年三月一度克復；海鹽——二十七年三月克復五個月，同年九月又克復七個月；崇德——二十七年九月一度克復；桐鄉——二十八年五月一度克復；德清——三十二年八月四日克復；武康——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克復。於此，須特別提出的：三十二年敵軍已深入湘鄂，戰場擴大，故我浙西游擊地區已無國軍；而此德清、武康的收復，全係地方部隊的功績。更須一提的，前述抗戰初期風起雲湧的游擊組織，為納入體制，俾發生整體力量，經軍政雙方的商決：屬於地方性的，編為區縣自衛隊，其幹部並輪流調至天目山浙西行署受訓。非地方性的，由第三戰區編為江南挺進隊，亦調赴後方訓練後，再入游擊區作戰——原為第十九集團軍薛岳所委任的二十七

、八年活躍在吳興、德清、崇德、桐鄉一帶的劉參、朱希所部，及前述京杭國道西的趙安民部，平湖黃百器部，二十八年均受編為江南挺進隊。據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民族日報刊載浙西行署三年度行政會議賀揚靈主任的報告，自行署成立以後，兩年來的整理，地方自衛的武力，已發展

至一萬餘人鎗。惟賀主任仍鼓勵：「今後各縣政府的武裝，應特別加強，什麼錢可以省，只有武裝是不可折扣的。在區鄉的基層武力，應盡力培植。」是以在對敵的積極戰鬥中，敵人憑武器、工事，固守據點，猶虞不足，如三十二年京杭國道吳杭段，亦為我地方部隊所控制，其對政治、經濟的圖謀，自更成夢想了。

浙西民風，向稱文弱。惟敵人入侵，激於民族大義，咸投袂奮起，捨身為國。如前述的攻城之戰，首先由民衆冒險敵人猛烈的炮火破壞公路、鐵路，毀斷橋樑，阻塞河道，以孤立據點，斷敵增援；然後由部隊以輕武器攻擊，其最後決勝，則為敢死隊的接近碉堡，以手榴彈向敵堡的機槍口投擲。而上項接敵行動，亦賴熱血民衆的勇敢嚮導。又如富陽敵人犯石灰山時，在沈場擄去嚮導二人，一名潘木士的嚮導，師先烈殺敵故事，導敵至我軍埋伏地——斷頭塢，敵被殲滅，潘亦壯烈成仁。至知識青年隨軍作戰，如東方雜誌復刊第八卷第二期侯暢先生撰「浙西對日抗戰與游擊戰」有男女政工青年黃匡等十餘人集體成仁於海鹽茶院，而二十九年一月五日，復有政工男女青年錢學能等二十餘人，成仁於嘉興鳳橋。……此項慘壯事蹟，不一而足，而熱血青年仍此仆繼，不避艱險的踏著血跡跟進。

### 三、浙西抗戰時期的對偽作戰

去年十二月在台北發行的中外雜誌第十六卷第六期載：

「羅卓英揚威域外」文中，所引十八軍羅卓

英將軍，於二十六年淞滬戰時在其「東戰場片羽」文中記述，有如下的一段：「漢奸太可恨了啊！敵機一來，總部附近，到處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則發信號彈。真是捉不勝捉。」二十六年淞滬戰爭激烈時，敵機晚間沿滬杭鐵路城市偵探，每見敵機過時，信號彈紛紛上升。而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敵機轟炸天目山浙西行署時，山間也先有稻草火燃起，然後敵機依煙火盤旋投彈，使歷史悠久的禪源寺和新建的竹木房屋，幾為之全燬。這可見敵人運用漢奸以謀我的處心積慮之深！

浙西偽組織的出現，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為隨敵人侵入而成立的「維持會」——後改「自治會」，受敵人特務組織「宣撫班」的指揮，奉敵國「昭和」的年號，其時間約為半年。二為偽「維新政府」於二十七年三月成立於南京，五月委汪瑞閣為偽「浙江省長」，體制仿舊北洋政府例，各縣行政負責者，稱「知事」，仍恢復中華民國年號。三為二十九年三月，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成立後，一切體制，全如我國民政府，省仍稱主席，縣、市負責人亦稱縣、市長。惟敵人利用流氓、乞丐，以金錢購買，使為破壞工作，雖稍有作用，而欲其組織政府，運用民衆，以我當時社會的抗戰情緒，如火如荼，參加偽組織工作的，既為人所不齒，其活動自如沙灘作塔、難收效果。而我則分別以：(一)摧其組織；(二)制裁兇凶；(三)策動反正以制止它的發展。效分述如次：(一)二十六年敵人登陸，首犯嘉興，惟「維持會」的出現，乃敵人由松江切斷滬杭鐵路後楔入吳江——由吳江

西犯浙境時，有嘉興縣屬新隴鎮地痞名郭劍石者，約一般同類者，至蘇境迎敵，敵人以所至咸堅壁清野，見此輩來迎，甚為喜悅，即給予命組偽組織的證明。郭以新隴與吳興及蘇境吳江為鄰，竟以「蘇、嘉、湖維持總會會長」名義，自兼「嘉興維持會長」，分派各地偽「維持會長」。惟當二十六、七年之交，各地「維持會」出現時，亦為游擊隊紛紛出現時期，由於「維持會」或「自治會」直接受敵人指揮，為敵採辦軍需用品、編組壯丁成立「愛路隊」，暨製發「良民證」等為敵人服務，人人指為漢奸。而興起的游擊隊伍，雖份子複雜，然既多受我方委任，更不乏忠義之士，待偽組織正向民間伸展爪牙，為敵擄取物資、人力時，各地游擊隊，不約而同的向偽組織攻擊，使各偽組織於受創之餘，不得不狼狽的退回敵人據點之內。(二)自「九一八」「一二八」敵人積極侵我之後，我各有關方面，亦即積極作抗戰的準備，除政府加強基層軍事、政治幹部訓練外，黨務方面亦注重社會各階層的佈置。就浙西地區言，以杭、嘉、湖三舊府屬為範圍，而此三舊府屬的首席偽主管，於二十八、二十九年先後為我工作同人在其託庇的敵人據點內制裁斃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偽「杭州市長」何瓚，於其寓所被擊，二十六日斃命；八月，偽「嘉興知事」沈翰卿，被殺於城西西堤橋堍；二十九年十一月，偽「吳興知事」顏大維，被殺於駱駝橋南堍。上三項制裁事項，均為浙江省黨部工作同人所主持。風聲所佈，自使偽組織人員為之喪胆。(三)我對偽組織的鬥爭，除攻擊、鋤奸以外，再為

利用從偽者的民族意識隨時策動反正，據東南日報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谷斯欽「方興未艾的浙西反正運動」文中所述，自那年敵寇「春季掃蕩」至執筆撰文止的半年間，浙西先後反正者，有駐吳興偽綏靖軍程萬軍部下的大隊長潘全盛，駐杭州偽綏靖軍徐懷誠部下的中隊長楊誠愚，駐嘉興偽十三師丁錫山部團長李啓蒙，及海鹽偽警察所巡官韓瑤亭，偽澉浦分所長丁鍾昌，敵海鹽部隊連絡事務所澉浦部隊連絡汪一青，餘杭偽區長彭瑞青，海鹽偽鄉長陸冠英，偽杭縣模範中學教員楊世高……等偽主要幹部數百人。其最足重視的，當三十一敵偽高唱第二期「清鄉」時，浙西行署反敵行動團大隊長俞文奎，於六月間在崇德被俘，押解至敵偽嚴密防守的長安。俞在長安，與偽自衛大隊附毛金根相處日久，毛頗敬俞之為人，俞乃相機勸其反正，再經崇德縣自衛大隊長吳良玉的策動（吳與毛為幫會弟兄），於十月六日晚佈置就緒，內外策應，七日由俞率毛部七十餘人，帶機鎗七挺，長短鎗五十餘枝，反正來歸，並即開至天目山整訓。使敵偽為之垂頭喪氣，徒呼奈何。

汪精衛偽組織成立後，羅致各方游離人士，除組偽府外，並設偽黨部，建立偽軍及特務組織，為圖游擊地區面的控制，三十年起，於江南地區，分期舉行「清鄉」，但亦徒勞無功。其經過如次：三十年三月，南京偽府成立「清鄉委員會」，主要陰謀：封鎖游擊區，殲滅我主力，進而圖完全「消化」游擊區，以遂其政治、經濟的企圖。其措

戶口，編組保甲，登記土地等基礎工作，故雖調動敵陸、海、空軍爲助，而其實施範圍僅以三、四縣爲限。自僞「清鄉委員會」成立後，準備工作半年餘，三十一年一月，始以蘇南吳縣一帶爲中心，開始第一期「清鄉」，我浙西嘉善的陶莊、天

一、特務警察」近千名，整編部隊——將各縣僞自衛隊改編爲僞保安隊——其中認爲聲名狼籍，不堪作戰的，由敵小林師團予以繳械解散，以汰弱留強；並用文字、口頭大作宣傳，提出「和平清鄉」「不抵抗不流血」等口號。當實施初期，大批敵僞軍日夜搜索，一夕之間，突增二十餘據點，沿鐵路線加強電網電流，水陸路交通要道普遍柵欄，以實施檢查行人船隻，誠足使胆小者聞風股慄！我方除嘉、平、鹽三縣自衛部隊，數度接戰後，陸續撤出封鎖綫，退集天目山，重行整編補充外，政治工作人員在反清鄉督導室督導下，分別潛伏，仍佈置交通，施行突擊。迨三十二年秋收時期，敵僞在「第二期清鄉區」正準備收取田賦、征購軍糧時，九、十月間，我整補後的嘉興、嘉善、平湖、海鹽、海甯各縣政府，重又得潛伏同志的接引，穿越佈置電網的滬杭鐵路綫，分別攻破若干據點，重又恢復政權。雖經敵僞數度圍攻，以我軍政人員不畏犧牲，民衆竭誠協助，政權終得屹立無恙，直至抗戰勝利。僞組織原定在「二期清鄉」完成後，滬杭鐵路以西京杭

國道以東吳興、德清、崇德、桐鄉地區舉行「第三期清鄉」。至此，僞方既無勇氣繼續辦理，敵人亦無信心協助了。

#### 四、抗戰時期浙西的對共鬥爭

三十八年，大陸變色。陷京、滬、杭的中共匪軍，是戰時在江蘇北部生長的陳毅所部。依戰時在蘇北發行新江蘇報的名報人包明叔「抗日時期東南敵後」一書所載：「共黨在蘇北、本無立足地。江都縣屬東南鄉大橋鎮，電燈廠司機朱寶山，與共黨方均聚衆，自編爲長江邊區游擊司令……當時爲數不足百人。……方與朱集合在二十六年冬，到二十七年春，方逐漸出局，此後才引陳毅到江北，與二李周旋（係指李明揚、李長江——筆者註附），以抗敵友軍爲掩飾，暗中擴充地盤。其過江的踏腳石，則是揚中縣。」「二十七年十一月間，新四軍方均約有一個大隊，駐江都東南鄉大橋一帶。」乃發展至二十九年八月，陳毅部由江都郭村，進陷泰縣、泰興、靖江、南通、如皋、東台六縣中心地的黃橋，蘇省主席兼三十集團軍韓德勤總司令命八十九軍李新甫軍長收復未成，十月五日李軍長殉難，於是「新四軍」益熾，戰時既爲害蘇、魯、浙、皖；大陸變色時期，連陷江南重要都市，爲禍之烈，實難言喻。

中共匪幫，在浙西底生存、活動和發展，所使用底所謂「策略路線」，雖是多型態與多樣式的，但萬變不離其宗，仍以「統一陣線」與「武裝鬥爭」，作交互運用，爲其伎倆。只以浙西在戰前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水準都較高，黨

政創導實施「二五」減租，也收有成效，地方基層組織又極健全，是以抗戰初期，它們在浙西，都還不夠充實，又毫無地方工作關係，與社會群眾基礎。在當時持久性與全面性的抗戰局勢下，既缺少機緣與把握的事實，所可能利用的祇是走依附政府、潛伏抗戰陣營內的路綫，強調「統一陣線」的策略。惟本文第二節所學的地方游擊隊的興起中，如李泉生的長超部隊，郎玉麟的菱湖部隊，沈子球的餘杭部隊，均與共黨有關，而當青年工作展開時，三十年前後陸續有姚旦（香港滙豐銀行職員，抗戰發生後辭職來投）、洪流、曹大鈞、徐珍、吳曼華、于以定、金浪涯、張洪仁等數以百計的共幹，滲透潛伏，分佈各縣，並以吳興、桐鄉爲中心，連綿蘇、皖，積極活動。就客觀環境言，共黨在戰區發展的有利條件：（一）爲地方領導階層的矛盾；（二）爲社會貧富的失調；（三）爲各方崛起的武裝部隊，各自爲政；（四）爲精神旺盛的青年羣失所寄託。而我浙西工作同仁，如浙西行署賀揚靈主任，省黨部辦事處盧光主任，駐軍首長陶廣、陶柳等領導層，不時舉行聯席會議，以討論當前所應解決的各項問題。浙西社會結構，既素稱祥和、健康，基層組織亦極健全，主政當局於戰時更注意平時建設，對鄉鎮保甲的加強與自治的推行，未稍鬆懈——各縣於三十二年即成立參議會，使地方各種意見，在議會中求取協調。至各地崛起的游擊隊，前已言及：分別編列爲地方自衛隊與三戰區挺進隊，均使成爲抗戰勁旅，中共既無法利用爲「武裝鬥爭」的工具，或轉化他們爲「紅軍」部隊，要在浙西敵後圖謀立

足點，也就落空了。

浙西主政當局，發現浙西的有利條件，在大敵當前，依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則，實施開放政治，即對於中共或左傾分子，除注意調查外，其能為抗戰盡力者，仍使其留於抗戰陣營中，如李泉生發表為桐鄉縣長，張洪仁為武康縣長，樂培文為新登簡師校長，郎玉麟已發現其有異動，及其交出部隊，仍任為行署視察，派往嘉興、平湖、海鹽等縣視察，沈子球亦留在臨安工作，於此更應特別提述者：為組訓青年與政工創制對中共的影響。中共的發展組織與發動顛覆活動，其重要手段為利用青年，役使青年替他們效忠賣命。浙省當局正視這一事實，同時鑒於二十六年冬京、滬、杭大撤退時，學校停辦或播遷，知識青年流離失所，為組訓青年，增強抗戰力量，於二十七年在新江中部的蘭谿，招集流亡青年舉行座談，即成立第一個政治工作隊。不久，抗日自衛委員會成立，此政工組織隸屬於該委員會，後為工作便利，納入政府組織；於省政府，各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及縣市政府，分別設置戰時政治工作指導室（簡稱政工室），另又組織省屬戰時政治工作大隊，及各區縣市屬政治工作隊。省政治工作大隊，首先挺進浙西前線及敵後，發動當地抗日志士，協助政府，建立敵後政權。筆者即曾任該大隊副大隊長。旋以大隊長方元民發表為吳興縣長以後，即由我擔任大隊長，二十八年，浙西行署改組，由省府委員賀揚靈接任主任以後，即將該大隊調回行署，整理補充，擴大為三個大隊，我因奉命轉任行政工作，離開該大

隊，先任行署經濟處，負責策劃對敵經濟封鎖任務。翌年冬，又調任為安吉縣縣長。擔任對敵、對匪的鬥爭工作。上述三個直屬政工大隊負責人，均為青年有為，富有戰鬥熱情之士，例如三十八年，參加上海保衛戰，任京滬杭警備總部文教處長，繼在浙海前哨舟山任省府政務處長，來台後且曾擔任亞洲反共聯盟副秘書長的談益民，即曾為當時直隸政工大隊長之一。這一戰時政工的創制，實發揮三天積極作用：(一)組訓戰時流亡有志青年，爭取他們直接參加抗戰救國的輔導作用；(二)政府於參加組訓青年中，得以選拔才俊，擔任建立敵後政權的幹部；(三)對中共的影響，既得藉組訓、工作行動、日常生活，及思想意識、表現與機遇中，便予清查與處理，又以主體為我方掌握，故共方雖精幹如姚旦、洪流；畸形人如吳曼華（駝背，身高不滿二尺，出入敵據點不須查驗「良民證」，曾為我方任甚多情報、通訊工作）等，雖亦混入政工隊中，終不能吸收青年，擴充組織。及三十年，皖南「新四軍」叛變平定，在浙西中共與江蘇聯絡的交通，同時於桐鄉縣境，被我們政府搜獲叛亂文件，曾公開活動的共徒，遂悄然向蘇境撤退。是以「新四軍」掃平後，在皖南舉行的檢討會上，軍政部何應欽部長對「浙西無紅點」，曾公開提出嘉許。相反的，如浙西不實施積極的政工制度，也許會將那些流亡青年，任之流在抗戰陣營以外，反為中共所拉攏、利用。但是不幸當政工隊正在巔峯狀態——敵前敵後每個角落都活躍政工青年時，却引起大後方「保守之士」所誤會，以為政工制度，乃破壞組織體制，

可能成為產生共黨的溫床，於是加以挑剔、歪曲；同時中共匪幫及其同路人，亦乘機栽誣誣陷，期望能拔去「眼中釘」。時適浙西地區抗戰形勢轉變，政府當局為了強化敵後政權，急需幹部，於是，至三十一年，部份政工人員轉任為各級政府、鄉鎮公所、人民團體、以及地方武裝團隊的組織成員；部份人員，轉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服務隊和行動隊（行動隊在敵後工作）而結束了政治工作隊的階段。筆者於本節開端，特提蘇北「新四軍」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以蘇北並無政治工作隊，而共禍泛濫，可見共禍的發生，在彼不在此——與積極運用青年並無關係了。

### 五、後 語

抗戰八年，浙西在面對凶暴的敵人，如野草滋蔓的偽組織，陰謀篡奪、無孔不入的共匪的險惡環境的戰鬥中，能獲「前方政治看浙西」暨「浙西無紅點」的榮譽，前已言及當歸功於政治基礎的良好，社會結構的健全，而利用這有利條件以發展這有利條件的，筆者以為還有三點值得提出：(一)政府正確的政策；(二)領導階層的合作；(三)工作同人刻苦忘我的抗戰精神。

以上三項，前文已有述及，茲再補充事例，以見真相：(一)地方自治為庶政的基礎，惟抗戰時期，一般人都認為係不急之務。而浙省則在抗戰愈進入艱苦階段，推行愈為積極，當推行新縣制時期，浙西孝豐、昌化，被指定為第一期實施縣份。而三十一年考核新縣制實施成果，孝豐曾得全省第一（當時縣長為劉能超）。憶二十九年四月

，阮先生以民政廳長身份，來浙西視察，沿途在各縣，詢問老百姓的保甲編次，並到戶政機關查看，一點都沒有錯誤。像這樣的推行地方自治，使在激烈動盪的環境中，仍能得到「面」的控制。至如行署賀揚靈主任，既積極組訓青年——二十七年在海鹽茶院成仁的第一批政工青年，就是他在紹興擔任行政督察專員時所訓練，隨六十二師渡江的一部。在行署時期，除培植政工隊、自衛隊外，又在天目山設立昭明館，和天目書院，以招待游擊區的中、老年人士，免為敵偽所質誘而為我用，真是做到徹底動員的目的。(二)戰時組織複雜，人事複雜，而權責爭持，如賢忌能，更是自古已然。惟浙西黨政軍領導層，既密切聯繫，常於會議席上討論當前問題，謀合理的解決。而於後方，則向省府求取了解與同情。筆者常見行署人員督省時，賀主任必命先向阮先生，詳陳浙西實況，與措施原則，阮先生亦常在省府會議席上，以「前方第一」之義，向會議同仁解釋支持。近見去年出版的浙江月刊第六卷第九期載周念行「憶故友」文，述開化朱兆豐係民初留日學生，曾在日參加國民黨，抗戰前任職警界，並為軍統局組織一份子。淞滬陷落，蘇杭失守，局方命其滲入敵偽工作，他受命後又受友人之勸，始入浙江偽民政廳任科長，調任德清偽縣長。他雖以假面具與敵偽周旋，但不能以軍統同志表露身份，致為行署突擊隊所誤殺，並蒙上惡名。抗戰勝利後，冤始得白云云。此事據王梓良所撰「浙西抗戰紀略」德清記事，為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此種事件，軍統局工作人員如魯莽處事，必與師問罪。

乃軍統局當時默不作聲；只記朱的參加及被殺事實，於勝利後，始再還其清白。當時尚無「團隊精神」一詞，而浙西有關方面，當時多以「勝利第一」之義，而實踐「團隊精神」了。(三)至抗戰精神的表現，實罄竹難書。二十七年三月，海鹽茶院政工隊十餘人成仁之役，筆者適亦於是日，代表三區專署，赴平湖放賑南返，經海鹽縣城時，我軍政已經撤出城區，目睹偽組織在城中張貼迎敵標語。經茶院轉激浦南渡覆命時，潮水已漲至腹部。以後率政工隊出入吳興敵後，在京杭國道，幾度見武裝敵軍，巡邏搜索，自己暫停於附近茅亭中，從不計及敵人如下走或上搜數十步，生命即將被奪的後果，以為國家受敵侵略，為國捐軀，理所當然。而留此身軀，即為計劃如何多殺敵人！至文中屢記政工青年和部隊的壯烈犧牲，在此時期，據王著「浙西抗戰紀略」海鹽記事，即如生活在十里洋場的青年黨籍的文化人胡雲翼，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亦在海鹽西塘橋廠內被敵所焚，幸敵艇啓旋，始得撲滅著火衣服而脫險。惟同時同地被殺的，有二餘人。以浙江政工人員為中心的力餘學社所發行的六十二年「力餘」年刊，有王梓良「憶抗戰精神」一文，言抗戰精神為「有血無淚，有國無家」八字，確屬的論。而王亦確實切實實踐，如他在抗戰開始時，已屬而立之年，為實踐「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之訓，任青梅竹馬伴侶的遠去。在戰時，又屢次謝却軍政長官結婚的媒介。三十二年四月，他受反清鄉工作督導室主任的推選，於軍政撤出後的「清鄉區」，冒險工作了三個月，佈置潛伏人員和

交通，搜集「清鄉區」實況到天目山後，某小姐以仰慕英雄的心理，在民族日報登了個和他訂婚的啟事，他也只表示歉意，仍歸返敵後工作。這種為多難的國家的前途，而不為家謀、不為身謀的抗戰精神，在戰時浙西是常見的。

惟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以不堪原子彈的轟炸而正式投降後，後方人士大批復員，為爭取地位，對前方戰鬥的人員，多方挑剔，尤其如別有作用的黃炎培，在參政會對先後曾在太湖和淞滬作戰的忠義救國軍，予以抨擊。致出生入死的浙西游擊區地方行政首長，主管上級亦未敢請頒發勝利勳章。而讀自由談社發行阮先生著的「大江南北」二八頁所記：「這人物俊秀，物產富饒的太湖與運河的區域，在抗戰中却首遭淪陷。八年之中，犧牲慘重。我於勝利後的第三年前往，創痕猶新。至於可歌可泣的忠義事跡，幾乎在每個鄉村中都有。其著者如嘉興新陸，在淪陷之初，有嘉興縣政府秘書及職員十餘人，全數被害。……又嘉興鳳橋，在二十九年二月五日，有敵後青年工作男女二十八人，為敵人包圍……活活燒死。又如烏青兩鎮，曾有一次敵人將我方鄉保長八十人，擄至江蘇境內，集體處死。凡此等地方，我都親往憑弔，並在鳳橋為立一紀念碑。時值凄風苦雨，獻花破土時，同行者莫不淚下。」如阮先生者，在戰後還追念浙西死難同人，筆者深為感動。並謹為浙西抗戰同人，謝謝他的同情與關念。